

君夏東元著新秋入序正却潮泗版

惠書備冊

# 盛宣懷傳

照收深慰欣於

潭弟廷麻

顧廷龍題



貴神遠和已上句彙要念之法了交更同防安二十日

基隆五開一任教法兵士人我各物一其年及出出

外馬尾口內戰艦六及開出口想其好整一八八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出版

# 盛宣懷傳

夏東元著 顧廷龍題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成都

责任编辑：蔡济生

封面设计：李文金

技术设计：盛寄萍

## 盛 宣 怀 传

夏东元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1/32 印张17.5插页9 字数373千

1988年4月第一版 1988年4月第一次印刷

ISBN7-220-00253-x/K·42

印数：1—1,500册

定价：6.60元（精装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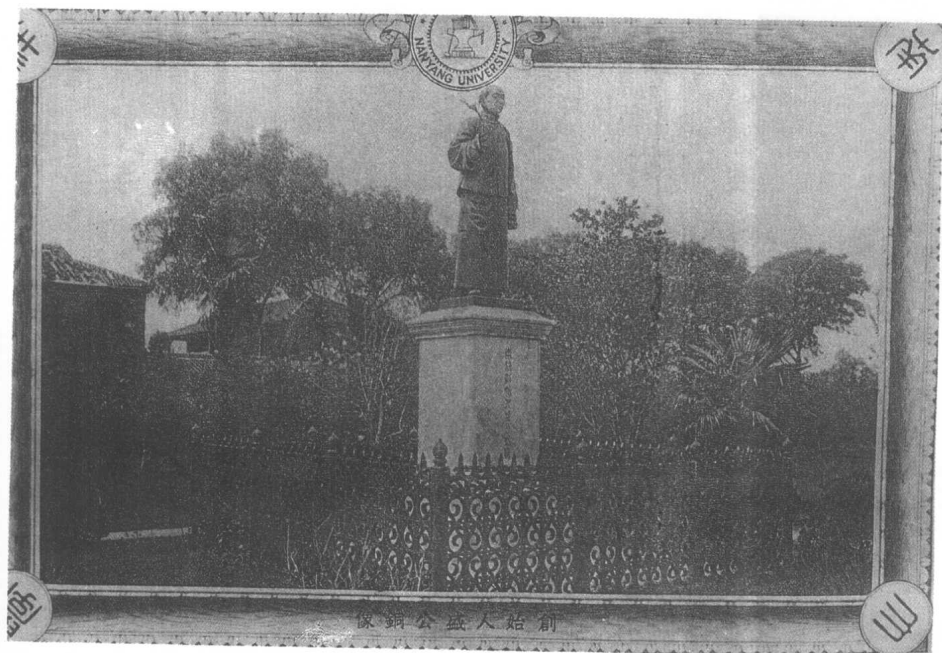


### 作者小传

夏东元，江苏省靖江县人，1921年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内访问学者导师。早年就读于上海诚明文学院，对国学造诣较深。1945年参加革命工作，曾在山东大学（解放区）政治系学习。长期从事政治经济理论的教学工作，先后在山东滨海公学、曲阜师范、山东医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讲授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基础等课程。从1956年起专作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尤侧重于洋务运动史的研究，自成研究体系，形成一家之言。他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从史料出发，运用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强调在忠实于史实，阐明历史规律的前提下，达到为现实服务的目的。著有《晚清洋务运动研究》、《郑观应传》和校编《郑观应集》等，影响较大。



交通大学复原的盛宣怀铜像



南洋大学创始人盛公铜像

南洋大学创始人盛公铜像

君聖先大人閣下新秋之序正加潤酒作康

惠書備細

獎師亦代字作款也種

照收深慰忱快欣程

津弟此麻

貴神連和止上如榮要念、法了空更開防處、上日  
甚陵二開一依教法兵士人、種天覽一其和厚止出  
外馬尾品向戰船是居開去、根甚如起以暇無非款  
走兵運懷以善漢戰地步我勢固失彼降、性大  
有不克成軍之勢向李梅方注這全權做想自己  
抄圖強以種想軍注武被族之無胆性並野完  
款、未先止止維石耳、累郭却伴著也累清行  
著遇甚如身於此席心期將屈受却死即得玉山  
仍派四位子、亲北姓累往灣珠免之味着着特請  
台安

愚弟感宣懷頓首

為生之不通代改也抄通沈之佩函亦傷字之夫不及

說字先与書開今日先分積平細注

日得疏語器有剛收仍已

酌宜表稿下身仰而此附片及附三房由

抄房个稿之傷廷領身行以上表路他三

爾稿仍先奉 呈册中

付此表法并 各者承執之更表係不

需亦否先清

閣下房个身是事有現本更和更作况能一

而自版是得身身仰 之法只合錄上可身

稿明註着批語如臣中个可合一切偏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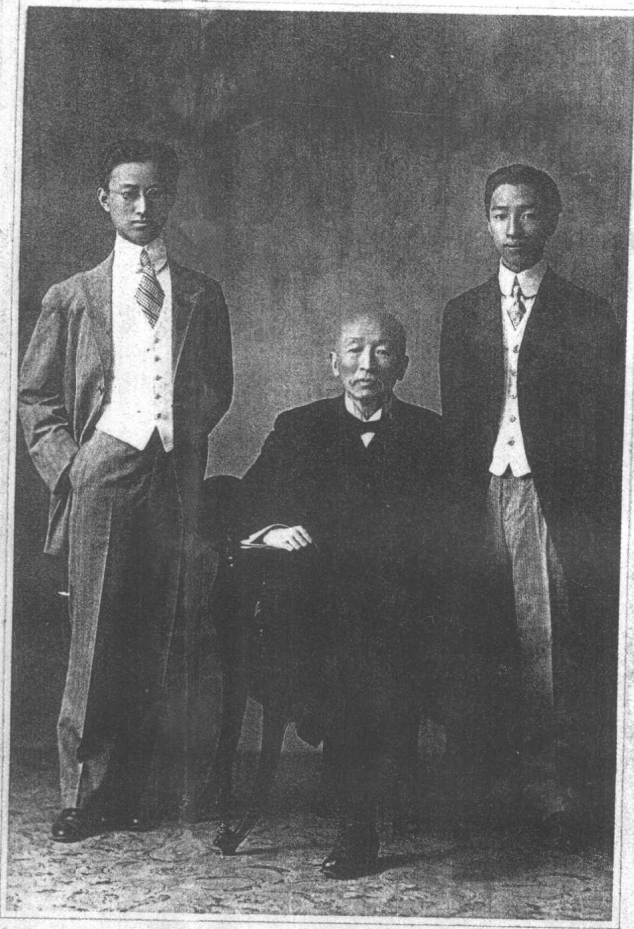
呈報、抄房等身印室個在力西招 御房

引快亦之合 呈上表身身

江蘇弟司感之身 身

盛宣怀手迹

子八月止更孝恩兒重兒赴東京丸木利陽也相此改装第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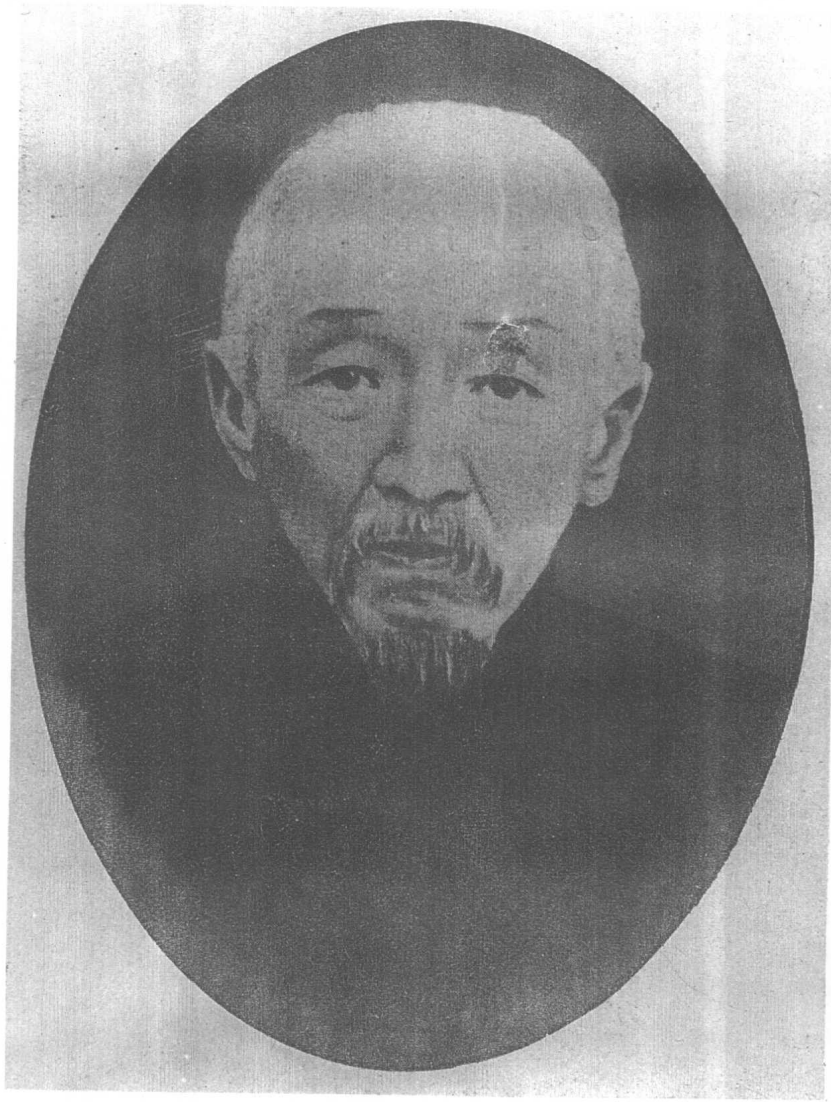
R. Maneki  
TRADE MARK  
SHIBATA TOKYO JAPAN

辛亥革命后盛宣怀改装照片





盛宣怀（杏孙）穿西装像



盛宣怀晚年像

# 盛宣怀新论

—代序

## 一、引言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同对所有历史事件的评价一样，必须置于历史发展长河的规律中，看他对于历史发展趋势起怎样的作用：是阻碍还是促进？是顺应还是违反？或者二者都有。并区别前、中、后各阶段的不同表现与社会作用，而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以经营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近代工商业为己任并卓有成效的盛宣怀，显然必须纠正过去多少年来一般地对他不加分析笼统地加上“大买办”头衔而加以否定的不公正的看法。

• 本文是1985年9月在兰州大学的讲学提纲。

7/105/1009



为了正确地评价盛宣怀，一定要澄清近些年来出现的一种说法，认为如果对洋务运动有所肯定，势必引起对于一些历史人物重新评价的麻烦。似乎是说，为了避免“重新评价的麻烦”，还是维持原来传统的对洋务运动否定看法为佳。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一切事物都在发展，历史科学也不例外。随着马克思主义水平不断提高和发展，资料的不断丰富和运用资料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社会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历史学工作者必将对历史上的问题不断有新的发现和新的认识。随之而来的必然对一些历史人物、事件有新的更为正确的论述。这是一。其二，对现实问题要有错必纠，对待历史上的问题也应该一样。绝不能因为是历史人物而对其错误的看法和说法，可以等闲视之。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呀！现将盛宣怀的一生分为“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佼佼者”、“保守的政治态度与进步的经济实践的矛盾”、“走了一条‘U’字型的路”等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 二、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佼佼者

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趋势，是资本主义必然代替封建主义。顺应这种趋势，并促进其发展者，在这一点上就是有其进步性和贡献而应予以相应的肯定。反之，阻碍这种趋势发展者，则是退步落后甚至是反动的，在这一点上就应给予否定。盛宣怀站在清王朝立场上，曾参与和策划过镇压人民起义和革命，并在其后期发展了买办性，但其一生主要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力经营者，对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应该予以恰如其分的

历史地位。

盛宣怀在1872年参与创办中国第一个洋务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之后，主持创办湖北煤铁开采总局、电报局、纺织等工业企业，到1896年及其以后几年，几乎独揽了全国铁路修建权与煤铁矿开采和冶炼，又与近代工商业发展相适应，办了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和中国第一所工业大学堂——天津北洋大学堂，紧接着又创办了始为中等专科后发展为大学的南洋公学。这些资本主义新事业，是当时中国社会所非常迫切需要的。

盛宣怀之所以积极地创办和经营这些洋务企业事业，是由于他认识到中国一定要变贫弱为富强，变落后为先进，才能不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欺凌。要做到这点，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盛公墓志铭》的作者陈三立说盛宣怀所办轮、电、矿、路“诸大端为立国之要”，是中肯之言。

追逐剩余价值和高额利润，是资产阶级本性，盛宣怀当然不能例外。但盛宣怀在攫取高额利润为出发点的同时，有着保利权分夺洋商之利的积极思想。创办轮船招商局是因为“火轮船为中国必不可废之物，与其听中国之利权全让外人，不如藩篱自固”；一手经营的电报，是为了“传递军报，……厚利商民”，抵制洋人“骎骎乎有入江之势”的在中国设线；办煤铁矿务，是由于购洋煤“利自外流，不若采中土自产之煤，利自我兴”。其后盛氏所创办和经营的铁路、银行、纺织乃至办学堂等事业，无一不具有适应时势需要和抵制洋商侵占权利两个特点。

为了适应时势和抵制洋商侵利，必须使自己的企业有较强的

竞争力。企业怎样就有竞争力？盛宣怀认识到，官本官办是难以做到的，主要应由将企业“视为身心性命之图”的商人来经营，也就是商本商办，才能较好的做到这一点。所以盛宣怀在创办近代企业中，除湖北煤铁开采因种种原因官本官办外，大都是主张商本商办的。他总是把“顾商情”放在办企业的首要地位。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持久的办下去，也才能达到富强的目的。尽管他有着将封建的“官”与资本主义的“商”混在一起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盛宣怀举办了中国近代社会所非常需要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适应了时势的要求；他在办企业的方针上，也基本上是正确的，因而除湖北煤厂以失败告终外，轮、电、矿等多数企业是成功的，起到了赢利和与洋商争利的作用。盛宣怀所经营的近代企业，及与之相适应的新式教育等事业，在中国当时都是新鲜事，是前人所未做过的事，无先例可循。因此，可以说，盛宣怀是处于非常之世，作了非常之事的非寻常之人。

### 三、终其生未能克服保守政治主张 与进步的经济实践间的矛盾

如果说盛宣怀在经济主张和实践上适应了中国的“时”与“势”的要求，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趋势，但在政治主张和态度乃至实践上，却是违反时势的要求的，违反民主制度必然要代替封建专制制度的社会实际的。并且，这种保守的政治主张和态度，与进步的经济实践间的矛盾，终其生未能克服。这是盛宣怀的致命伤。这个致命伤要追溯到他开始创办近代企业时的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也就是李鸿章在1877年所说的盛宣怀“欲办大事，兼作高

官”。这里所说的“大事”就是指洋务工业企业。在当时，对清政府说，任何大事莫过于关系到清王朝存亡的洋务事业，对盛宣怀个人说，所有“大事”当然也莫过于办洋务工业企业。在李鸿章讲这句话时，盛宣怀还是一位如李所说：“官既未操左券，事又无从着手”的青年。盛氏似乎意识到，“作高官”要先把洋务企业的“大事”办成才有可能。这种“高官”与“大事”是矛盾的，因为用资本主义的“大事”，作为做封建专制主义政府“高官”的资本，这不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翻版和引伸吗？不加克服，必将与这一思想体系付诸实践的洋务运动同一失败的命运。

盛宣怀一生旅程基本上是按照“办大事”为资本，逐渐达到“作高官”的目的的。他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举办轮船、电报、矿务、纺织等企业的基础上，开始作官了，继1884年署天津海关道之后，很快于1886年秋正任南北洋“中间站”的山东登莱青道兼烟台海关监督；1892年调任起着北洋大臣（由直督兼任）参谋部作用的天津海关道，直至1896年。1896年是盛宣怀大发迹的起点。这一年他担任与国民经济命脉密切相关的汉阳铁厂、铁路总公司、中国通商银行等企业的督办，被授予太常寺少卿和专折奏事特权。此后盛宣怀的官阶扶摇直上，大理寺少卿啦，会办商务大臣啦，工部左侍郎啦，等等，到1908年被授为邮传部右侍郎，1911年荣膺邮传部尚书了。真的“作高官”了！兹所以官阶升迁如此之快，又如此之高，主要是由于他基本上控制了所有重要的洋务民用工业企业，经济上成为支持清王朝的有力柱石，和对外关系上的有力帮手，成为清政府不可或缺的人。而这，也正是盛宣怀的悲剧。照理，资本主义发展，必然要求资产阶级民主制

度与之相适应，但盛宣怀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却是想作高官，作封建专制政府的高官，这是与民主制度不相容的。而且官阶愈高，同他所控制的新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愈大，终致在政治上成为辛亥革命的对象。因此，1896年是盛宣怀官阶上大发迹和经济企业大发展的起点，也是在落后保守的政治思想明显表露出来从而走下坡路的开始。

讲到这里，须要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在过去一些著作里，常常有人以盛宣怀赚了许多钱作为诋毁贬斥他的依据。这是不公正的。众所周知，剩余价值规律曾起过发展经济和推动历史前进的杠杆作用，盛宣怀之所以办了那么多企业，发了那么大的财，剩余价值规律的推动作用显然是的。他为此而创办前人未办过的工业企业；为此而招集商股将闲散资金化为有用；为此而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此而办正规的新学堂和派遣留学生；为此而与洋商斗或和；为此而与一切敢于同他竞争的对手斗或和，从而导致了推动经济的巨大发展和进步。我曾说过：“盛宣怀的问题，不在于他用商本以谋利，而在于他：既似商又似官，由似官而为官；用商力以谋官，由倾向于官发展到利用官势以凌商。”以追逐剩余价值和高额利润为目的的盛宣怀，当然是“商”，但他在办洋务民用工业企业那一天开始，即是以官方代表身份出场的。“用商力以谋”资产阶级的“官”，谋民主主义的“官”，并反过来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那当然是进步的。但他谋的是封建专制政府的“官”，就必然从以“官”护商发展为“利用官势以凌商”。到辛亥革命前夕，由民族资本家变为用“官办”将轮、电、铁路、矿务银行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



的企业联缀起来企图实行垄断的资本家了。

由于盛宣怀充当封建政府的“官”，他就必然反对政治上的民主性的维新改革。如在戊戌维新中，盛宣怀公开提出与康、梁等人相对立的变法方案，说什么“中国的根本之学不必更动，止要兵政、工政两端采取各国之所长。”到清政府搞预备立宪时，他才附和说：“但求宪法顾得住君权，未始无益。”这与清政府的御制立宪异曲同工。

由此可见，追逐剩余价值以致富，对盛宣怀不应贬而应褒。他如果由发展资本主义而为资产阶级民主政府的官，也无可非议。但盛宣怀当的和升的是封建的“官”，这不仅应该贬，而且也多少影响到他的民族性的资本主义性质，而一度带上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味道了。这就是说，这种垄断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而是用“官力”把各种企业联缀起来的。盛宣怀并不隐晦这一点，他说：“目下留此一官，内可以条陈时事，外可以维护实业。”

第二，如果说盛宣怀为了“作高官”而“办大事”，又以“高官”的力量把资本主义的“大事”带上官僚垄断性，“官”多少影响到经济的性质，那么，盛宣怀为了他的“大事”即经济的稳定发展，而影响到政治外交上处理方针，“东南互保”是明显的例证。由于盛宣怀经营多年的招商局、铁厂、铁路、矿产、银行等经济设施，主要集中于长江中下游，他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搞东南互保，却也正符合英美帝国主义的利益。

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和义和团运动中，各种势力的关系是很复杂的：慈禧太后为首清王朝与义和团的关系，八国联军侵略者与清王朝的关系，盛宣怀与清王朝及其与八国联军侵略者的关